

改造教育與 變化氣質

總統 蔣公

—民國40年11月19日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第15期研究員畢業典禮講詞—

關於教育的重要，我在今年九月三日的一篇「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講詞中，曾經特別指出教育是黨政業務最重要而基本的工作，並提出「民主」「科學」與「救國」三個口號，作為今後教育的標幟，希望本黨中央以及行政部門，各級主管教育的從政同志，詳加研究，制訂方案，以實現三民主義的救國教育，亦就是目前所急切需要的反攻教育。我不知道黨政主管同志，已經在進行研究設計沒有？今天我要重複地強調教育對於革命建國事業的重要，更要指示大家切實了解的，是今日我們所要的教育，是救亡圖存的教育，決不是像西方富強國家那樣富麗堂皇奢侈豪華的教育，這因為我們當前的環境如此，當前的需要如此。我們決不能再辦好高騖遠、不切實用的教育了。什麼才是三民主義的救國教育呢？那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復國的精神教育和生產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職業教育。

第一需要精神教育。大家如要實行反共的教育，那首先就要知道什麼是共匪最怕的、而且是他最恨的教育，無

他，那就是他唯物史觀所最反對的民族教育和精神教育。什麼是民族的和精神的的教育？這就是我時常所說的，我們「固有的民族德性」教育。我在最近「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以及前面所宣讀的「四維八德的生活化社會化」的講詞裏，都曾經一再苦口曉音的提醒過了，總要大家重視這四維八德——民族精神的武器，如要運用這民族精神的武器有效，那就先要改變從前為共匪宣傳所籠罩的舊觀念，就如我前面所宣讀的「以為在今日和朱毛奸匪的鬥爭中，還要拿四維八德來作為主要的精神武器，那簡直是不合時代潮流，違背時代需要」，如果大家仍舊要用那種想法的教育來反共，是絕對犯上了嚴重錯誤的。以我這幾年來的革命經驗，和這一次的失敗教訓，所反省體會的結果，確認只有四維八德，才真是我們國家民族命脈之所繫，也只有四維八德，才是我們反共抗俄、自救救國的唯一精神武器。不僅這四維八德是我們打擊奸匪的精神武器，就是我們所有的優良傳統文化，只要運用得當，都可打入敵人的心坎，瓦解敵人的組織而有餘。我們只要大家不忘其民族精神，不自墜其民族道德，就必能使我們民族的命脈，綿延發揚，使我們的國家根基，永固不墜。尤其是我們面對著朱毛奸匪，正在以各種毒辣的、陰狠的、恐怖的、無恥的手段，來消滅我們的民族精神，搖撼我們的民族意志，戕害我們的民族倫理的今日，我們必須猛省，必須憬悟，必須重新抱持我們的民族武器，去打擊我們的民族敵人，那是不再容許我們鬆懈，並鄙棄我們自己惟一精良

的武器了。這意思我已經在前幾次講詞裏反覆痛切地說明指示過了，這裏不必再來說。今天只是希望你們能夠徹底研討和規劃，究竟要如何才能在社会教育、學校教育中，使民族道德，具體而實用地生活化、行動化起來。我個人以為社會風尚的培養，學校教育的啓發（特別要注重公民和歷史、地理的課程，以及課外的活動和軍訓），食衣住行育樂的規律，各種社會運動的配合，以及輿論的激揚，社會的制裁，和表彰好人，鼓勵善行等等，都可以有助於民族道德的生活化、行動化。就是過去新生活運動中，行之有效的方式與程序，都可以採用，只要能擴而充之，勉強行之，就一定能夠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和充實我們革命的基本力量。在這一個精神教育中，應該以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並應以學校教育為核心，而以社會教育為整體，由近而遠，由點而面，篤實踐履，含宏光大，這樣就能夠體用兼備，行之有效了。

第二需要生產教育——就是職業教育、技術教育，也可以說是勞動教育。這在我那篇「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中就已經講過：「我們在智育上像生產教育、職業教育與技術教育等等，如果都能有計劃，都能齊頭並進，那我們亦就不至使國家長陷於此一貧弱之境，以致於今日的敗亡至此。」我不知道大家對這一段話，有否同感？我們試檢討一下，歷年學校教育的結果，以及目前學校教育的比重，究竟對生產教育是否曾加以重視？是否已有若干成果？據我個人的看法，現在計劃教育，各種學業配合，雖比

大陸上有進步，但照今後需要來說，我們對生產教育實在還是太不重視了。大家只要看看我們臺省公私立的普通中學，是多得不可再多，而職業學校，則寥寥無幾。在大專以上學校的科系學生，也是文法多於理工。大專以上姑且不說，單是普通中等學校，學生的數目成千成萬的畢業，這些中學學生能有升讀大專學校機會的，恐怕是很少很少，這樣就要如同從前大陸上的中學畢業生，他升讀既勢所不許，就業又本無所長，若轉而從事農工，則已不習勞苦，於是彼輩即無法逃避其「畢業即失業」的現實和苦痛。一般來說，就只好游手好閒，做社會的寄生蟲了。我不知道現在的教育計畫，對於將來學生的出路，究竟有否徹底的打算，又是否與我們反攻大陸計畫，能夠切實配合？我總覺得我們的普通中學越多，就損失有用之才越多，也就使從事實際生產的越少，倒反而使社會寄生的繼續增高，有加無已。這不但是今後的一個非常嚴重的教育問題，也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看大家現在還只是沾沾於新添了多少所學校，學生的比率又增加了多少，却不注重其學生畢業以後的出路如何？其對國家的貢獻又將如何？更不曾意識到經由這種教育所產生的，將盡是一些富有士大夫意味而不肯去從事勞動和生產的份子。至於刻苦耐勞，節儉樸實，對於反共必要的武藝技術，和紀律生活，與愛國救國，知恥雪恥，自立自強，自力更生的精神教育，那更談不上了，這真是太可怕了。在這種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之下，而欲求人人有職業，人人不失業，人人能反共，人

人能救國，各負其責，各盡所能，那真是無異於緣木求魚。我們的教育制度，像課程和學生的生活等等，其亟待檢討改善的地方還多，我以為當前臺省教育最急要的，莫過於普遍興辦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使人人皆能有其一技之長，以從事生產。並提倡勞動教育，使人人皆能習勞崇儉，掃除士大夫階級的意味。我們今後計劃教育，至少應該在職業教育、技術教育上，有一個合理的重點，合理的比例，那才能逐步達成我們三民主義救國教育的目的。

第三、還要補充的一點，就是教育的方針和方法。我以為今日教育，要使他發生反共救國的效用，無論是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最要緊的是注重生活教育，必須使生活與教育打成一片，所以我早在抗戰以前，提倡我們的教育必須教與育並重，手與腦並用，尤其要文與武合一。中國古代教育所謂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教育，亦就是教與育、腦與手、及文與武合一的中國教育，後來在抗戰之前，我又將禮、義、廉、恥的四維，加在社會教育——新生活運動之中，這我認為是抗戰期間收效最大的一個發明。你只要看當時日本傀儡的汪偽組織成立的時候，全國人心與輿論，都對那些漢奸竭力反對，與一致摒棄，這是禮、義、廉、恥四維教育的功效。但是今日赤俄傀儡的毛偽組織成立以後的情形，一般智識份子，却趨之若鶩，靠攏投降，恬不知恥，這就可證明當時四維教育之於人心的效果了。只要一般國民能夠明禮義，知廉恥之後，那他亦就能明春秋大義，與夷夏邪正之分，所謂「漢賊不兩立，

敵我不並存」。這種不共戴天的氣節和精神力量，真足以掃除漢奸之魄，而奪其魂，其功效之大，決非任何物質武器所可比擬。但是為什麼日本傀儡，與赤俄傀儡，汪精衛與毛澤東，同是漢奸，而一般人的心理，對過去汪偽組織如此摒棄誅伐，羞與為伍，而對今日毛偽組織，如此靠攏投降，恬不為恥呢？這就是在抗戰後期，尤其在勝利之後，共匪就是用他全力，在有意無意與不知不覺之中，施弄其各種陰謀，摧毀我們民族意識，消滅我們國家觀念，凡是與四維八德和新生活運動有關之教育與風習，他必想盡方法，使之毀棄無遺。而一般知識階級，又隨風逐浪，道聽塗說，以共匪所好好之，共匪所惡惡之，共匪之是為是，共匪之非為非。於是整個社會不僅是非不明，而且利害不分，因之禮義掃地，廉恥蕩然，就是這樣斷送了我們大陸於俄共魔掌之中，以至國既不國，人亦非人，而大家至今還是莫名其妙，豈不可痛！大家如果真能照我二十年來所倡導的教與育、文與武合一並重的教育（以六藝四維為我們教育的中心），始終一致，貫徹到底，那我相信決不至有今天國破家亡這樣的悲劇。不僅共匪不能有這樣倖倖一時的勝利，而且早已被我們消滅了。

這上面只不過是我對教育提出的幾點初步意見，至於如何整個檢討，徹底改進，那就要黨政主管同志，去切實負責研究。我以為今日革命實踐研究院的教育方針，自不足以概括一切教育，但這亦可作一個參考的重要資料。務望積極設計，實踐推動，勿再延誤。現在共匪亦正在大陸

上大舉他所謂改革學制，縮短學程，特別以馬列主義，爲其一切的中心，以從事赤色毒素的麻醉，和增產技術的訓練。他必欲毀滅我五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以鞏固其永爲俄帝附庸的極權暴政的基礎，我們正面臨著這與奸匪生死搏鬥的回合，難道還容許我們對革命建國的根本大計——教育事業，像現在這樣漠然坐視，無動於中？大家要知道，我們現在不僅要研究當前的教育制度，以適合雪恥復國救亡圖存的需要，更要研究如何在反攻以後，號召大陸上的同胞，激發其靈魂的覺醒？及在反攻以後，如何清除奸匪的獸性教育所遺留下來的毒素？教育文化界的同志，不僅要有淵博的學問，篤實的品性，尤其要有崇高偉大的抱負，救國匡復的志節，唯其如此，那才算具備了大教育家的規範，也才能真正的培育國民的人格，導致國家的富強，「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這是我今日所特別期望於大家的。

其次，我要提出來的，是如何變化氣質和爲什麼要變化氣質的問題。張橫渠說：「學者先須變化氣質。」又說：「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這就是說教育的要務，莫要於使學者能變化氣質。氣質所關係革命道德、革命人格者，更是至深且鉅，所以我曾再三地對大家講：「如要完成革命責任，必首先要變化氣質。」今天我特別要將這些問題，次第加以說明：

現在先說明，爲什麼要變化氣質？關於這一點，總理早就說過：「要做革命事業，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就

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這所謂要革除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性質，我們可以下一個轉語來說，就是變化氣質。總理又說：「革命是人類的覺悟，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當然誰亦想他要救自己。只是不懂得如何救自己而已。根據總理所說，那變化氣質才是救自己之一法。因爲只有變化了氣質之後，才能從人欲橫流中救回自己，確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觀，擔當當前的革命責任，完成艱鉅的革命事業。

其次是要說明：什麼是應該變化的氣質？從前明代的哲學家劉念臺——他又是一個大教育家，他說：「學者惟中有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這所謂中立病，並非指著對黨派騎牆而言，乃是指對思想糊塗，不着邊際，依違兩可之間，就是指這一種無可無不可的心理而言。大凡一個不激不昂、無可無不可的人，就沒有方法可以從他的身上，找出一些血氣，更沒有方法從他思想中，刺激他一點革命的情緒，他一切只是悠悠忽忽，得過且過，決不肯負一點責任，尤其是他可東可西，無處不是投機取巧，隨風轉舵，決不會與人家有所爭忤，根本就不要他自己的立場，這種人既無志節，又無骨氣，是最可恥的東西。萬章問於孟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焉，無所往而不爲愿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由孟子所指斥鄉愿的這一段文字來看，亦就正是我們所說的「官僚氣」。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這是怎樣說的呢？這就因為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你要指責他却無明顯罪證可以指責，你要糾舉他，亦無具體事實可以糾舉，如果你要在其身上刺激他一下，可是他的皮膚很厚，無論如何，也刺他不出一點血來。我們現在雖然去孟子之世已遠，然而像這類的「官僚」、「鄉愿」之氣，至今却愈演愈烈了。我們在大陸的失敗，就失敗在這一類的「官僚」、「鄉愿」的氣味太深的人的身上，我們今後如要打回大陸，擔負革命責任，切不可再像過去那樣混沌模糊，悠悠忽忽的過去，我們必要改變這些以往的官僚習氣，無論何事，總要劈頭判個是非，辨個善惡，而決不能再學鄉愿爲自得了。

至於變化氣質的入手要道，我以爲莫如朱子所說：「恥有當忍，有不當忍，人須有廉恥。」又說：「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哉』，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我們要大家有所不爲，然後始能有所爲。有所不爲，就是「知恥」，有所爲，就是「革命」。怎樣才能有所不爲呢？那就是要大家辨個是非，認個義理，劉念臺說：「見得是處，斷然如此；見得不是處，斷然不如此。」這就是說，不是處斷然不爲。還有更要緊的一點，是要大家勿以善小而爲，惡小而不爲，如善而不爲，惡而

不去，則雖小亦恥也。所以我們要變化氣質，就先要知恥。光是知恥，還是不夠，知恥之後，必要雪恥才行。王陽明說：「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見得真切，做得真切。」我們前面所說的「知恥」，自然是真切的覺悟，但是問題就是看我們能否如救火治病，抖擻精神，真切地去做，亦就是能否真切地去雪恥罷了。不然如果稍一悠悠，稍一蹉跎，不能實踐篤行，雪恥圖強，那就要「一虧一切虧」，雖是知恥，亦就不中用了。

總之，變化氣質，是我們確立革命的人生觀，堅定革命志節的起點。

我這所說的變化氣質，不僅是對黨員的期望而已，我們更要推及到學校裏社會上去，我們不僅變化一般黨員的氣質，更要變化整個社會所有民衆的氣質，大家要知道，現在是我們要以我們七百萬人去救回四億五千萬人的國家和民族轉來的時候，這責任是如何地艱鉅，時機是如何地緊迫，我們必須激厲奮起，死中求生，再不能自誤誤國了！但是我們如要擔負革命復國的責任，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就必先要從變化已往「官僚」、「鄉愿」的氣質做起才行。

上面所提出來的這兩項「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的要旨，希望大家不再泛泛視之，務須詳切研究，具體規劃，全心全力，一致奉行，那才能深植我們革命復國的根基，也才能發揚我們革命建國的精神，重建我們三民主義的救國教育，達成我們第三期的革命任務。